

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近年來，女性主義思潮與性別議題蔚為風行，其中以心理學與社會學角度研究男女間性別認知差異之專書數量最為豐富，從美國心理分析學家斯托勒(Robert Stoller, 1925-1991)的《心理性別與社會性別》(Sex and Gender, 1968)、馬尼(John Money)與艾哈德(Anke Ehrhardt)合著的《男人與女人，男孩與女孩》(Man and Woman, Boy and Girl, 1973)至當代大衛·吉兒摩爾(David D. Gilmore)的《厭女現象》(Misogyny: the male malady, 2005)等著作，性別議題持續四、五十年，至今仍未退燒。除了心理學與社會學之外，以女性主義為途徑的文學批評專書也不少，譬如芭芭拉·賀爾特(Barbara Heldt)的《戰慄的完美》(Terrible Perfection, 1987)便是第一本以女性主義角度分析俄國文學的專書，之後陸續出版喬·安德魯(Joe Andrew)《俄國文學中的女性：1780-1863》(Women in Russian Literature: 1780-1863, 1988)與厚辛頓(Sona Stephan Hoisington)《她自己的情節：俄國文學中的女性角色》(A plot of her own: the female protagonist in Russian literature, 1995)等論著。許多西方學者企圖從文學作品推演出俄國男性作家的厭女心理並挖掘俄國婦女受壓迫之現象。然而，迄今台灣卻尚未有任何專書以文化角度研究俄國女性，筆者因而決定從文化角度出發，研究俄國女性角色之發展與「新女性」形象及特質之文化演變過程，並將論文題目訂為「俄國『新女性』型塑過程之文化研究：一八六一～一九三六」。

十九世紀中葉，俄國沙皇受西歐影響，推動工業化與現代化政策，企圖將落後的傳統農業社會轉型成現代化工業都市。一八六一年亞歷山大二世解放農奴，農民進城求職，俄國步入都市化階段。都市化使俄國政治、經濟、文化、思想與社會結構產生劇變，其中以鄉村與城市人口結構改變對社會影響最大。男人從傳統農夫變成城市工人，農村勞力的空缺只能由婦女遞補。女性為維持生計與照顧家庭，漸漸從家庭附屬地位變成主導地

位，甚至出現大量走出家庭工作的工廠女工。¹ 從這段時期至一九三〇年間，整個俄國社會以女性角色變化最為顯著。² 教育普及使得平民知識份子數量漸增，向西方學習的社會風氣與心理驅使許多俄國男女出國留學。女性教育水平提高，範圍也從貴族階層深入至中產階級之女性。西化的知識份子將西歐社會男女平權的思想引進傳統的俄國封建社會，男尊女卑的社會觀念與傳統性別特質受到質疑。在這些西化知識份子的鼓吹下，女性開始滲入過去由男性主導的公共領域。她們致力將兩性平等意識帶入俄國，欲改變男權主導社會下女性之悲慘命運。儘管遭遇許多挫折，「女性問題」成功引起社會大眾注意，而這些不同以往的俄國女性便被稱為「新女性」(Новая женщина)。一八六〇～七〇年代除了國家與社會問題，婦女解放、女性主義與激進改革思潮同樣為社會爭論的焦點。

當時俄國男性知識份子對於這些時代造就的「新女性」存在幾種看法。西化派人士大多持贊同、樂觀的態度，如車爾尼雪夫斯基(Николай Гаврилович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1828-1889)在小說《怎麼辦？》(Что делать?, 1863)中，創造完美的「新女性」典型薇拉·帕夫勒夫娜(Вера Павловна)。部分男性知識份子持中立態度，他們同情女性，贊同女性受教育與追求自我理想，但卻反對「新女性」過於激進的作法，譬如屠格涅夫(Иван Сергеевич Тургенев, 1818-1883)便屬此類。最後一類則是堅持傳統的保守派知識份子，他們反對女性走出家庭，因而對「新女性」持負面態度。托爾斯泰(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 1828-1910)為此看法之最佳代表。然而，八〇～九〇年代改革沙皇體制的聲浪掩蓋了婦女問題。許多男性，包括市民階級與知識份子，都只關心自身利益，忽略有關女性權益、性侵害、賣淫等問題。男性甚至擔心解放後的女性會成為無法控制的群體，造成社會混亂。

當時部分較為前衛的「新女性」則由於自身經驗累積與擺脫傳統的強烈欲望，發展出獨特的婚姻、家庭及兩性平等概念。「新女性」成為一股新

¹ Clements, B. E. and Engel, B. A. and Worobec C. D. ed. *Russia's Women: Accommodation, Resistance, transform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p139.

² Attwood, Lynne and Kelly, Catriona. *Programmes for Identity: The New Man And the New Woman// Constructing Russian Culture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 1881-1940*. New York: Oxford UP, 1998, p276.

興階級，對社會秩序造成衝擊。薇爾畢茨卡婭(Анастасия Николаевна Вербицкая, 1861-1928)、柯隆泰(Александра Михайловна Коллонтай, 1872—1952)與阿爾曼德(Инесса Фёдоровна Арманд, 1874-1920)都是當時極為活躍的「新女性」代表。她們期望政府能協助女性擺脫婚姻與家務的束縛，成立公共育兒所與公共廚房等機構。然而，男性卻仍期望女性能擔起傳統家庭責任。因此，這些女性對「新女性」角色之期望和男權社會產生衝突與矛盾。

蘇聯政府建立後，在共產政權的刻意主導下，蘇聯「新女性」的特質獲得新的詮釋，成為進步與平等之象徵。蘇聯「新女性」除了工作勤奮的黨員身份外，還必須扮演好妻子與「蘇聯母親」(Soviet mother)的角色。二〇年代女性亟欲擺脫的傳統功能，至三〇年代卻變成「新女性」特質。「新女性」角色在短短幾十年間從家庭走到社會，再漸漸回歸家庭。「新女性」特質不僅象徵女性運動發展，它代表一種意識型態。生理性別(sex)或許只牽涉到男人與女人在生理上之差異，但性別認同(gender)卻與社會、文化有極大的關係。男性與女性在不同的社會期待下產生不同的思維方式，「人們傾向於相信他們已瞭解到，一個人是男是女，並不是因為透過生理上的檢查而決定這個人是生物意義上的男性或女性。相反地，我們往往會去注意一個人是否具有男性氣概或女性特質。在我們的社會中，性別是個人的一項社會性特質，此特質只在某些時候才會與生物性別相互一致。」³ 所以，一般認為的女性氣質乃是社會建構出來的結果，而非女性天生如此。男性依照自己的期望塑造女性特質，藉由社會化過程讓女性在無形中受到箝制。也就是說，性別意識型態透過社會傳播與灌輸，進入女性的意識中，此一過程即為「型塑」(fashioning)。⁴ 十九世紀男性作家筆下的新女性、女性自我期許的新女性及蘇聯共產社會的蘇聯新女性，這三種不同的認知代表不同的意識型態，同時發揮不同的文化作用。本論文之研究範圍從一八六一～一九三六年，主要探討十九世紀後半到二十世紀三〇年代這段社會動盪不安時期所產生的新女性概念。一八六一年農奴解放不僅對俄國社

³ Schwartz, Pepper and Rutter Virginia。《性之性別》。台北：韋伯文化國際，2004，頁3。

⁴ 格林布雷特(Stephen Greenblatt,)乃是第一位從文學角度探討型塑過程之學者。他在《文藝復興時期之型塑—從摩爾到莎士比亞》(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 From More to Shakespeare)一書中提出個人認知並非自我發展之結果，而是外界型塑之結果。

會與經濟有重大影響，它與女性解放運動也有相當程度之關聯。農奴與女性乃是當時受到社會壓迫的兩大族群。農奴解放帶給女性無限的希望，她們希望能掙脫男權社會束縛，像農奴一樣獲得自由與尊重。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後，俄國社會陷入紅白軍內戰，儘管內戰於一九二〇年結束，整個社會結構仍舊混亂。蘇維埃政權尚未掌握文化霸權。知識份子仍擁有部分的言論自由，反對蘇維埃政府女性政策與官僚主義的聲浪四起。因此，一九二〇～三〇年代被視為蘇聯最自由的一段時期。女性主義者於此時提出性革命解放運動，為「新女性」最活躍的時期。然而，一九三六年史達林頒佈新憲法，規定蘇聯公民必須遵守公共生活準則，要求全國百姓依照政府規定生活，運用政策與法令約束人民。「新女性」特質不再由女性或其他知識份子定義，而由蘇維埃政府決定「新女性」的形象與特質。因此，本論文將研究年份訂為一八六一～一九三六年。本論文不僅以探討統治階級如何透過意識型態的控制影響「新女性」特質與女性的自我認同為主題，更從「新女性」特質意識型態發展企圖研究俄國從沙皇封建制度到蘇維埃共產政權穩固時期之文化霸權建構過程。

英國文化研究學著雷蒙·威廉斯乃是將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 (Antonio Gramsci, 1891-1937) 提出的霸權 (hegemony) 概念應用至一般文化現象之人。他認為所有文化建構過程都是經由殘留、主流與新興三股力量交會演變而成。這三股力量各自產生不同的意識型態與文化，三種文化的相互影響將決定統治階級是否能穩固其政權。西方馬克思主義乃是延伸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概念而發展出的文化理論，但統治與被統治關係並非僅存於資本階級社會，號稱摧毀階級制度的蘇維埃無產階級社會同樣存在統治與被統治關係。一八六一年到一九三六年正值俄國新舊政權交替之時，社會混亂且人民思想自由，殘留、主流與新興文化之互動尤其明顯。因此，筆者決定以雷蒙·威廉斯的文化理論為途徑，探討沙俄末期到蘇聯初期這段權力轉移期間的文化霸權建構過程 (hegemonic process)。

美國文學理論學者路易斯·孟特洛斯 (Louis Adrian Montrose) 曾說過：「具體文學作品的解讀，是一種意義深遠的社會調節行為，一種通過文學

作品揭示社會性深層意義，並反映出這種意義的對當代活動之影響。」⁵ 文學作品不僅反映社會矛盾，還具有調節、宣洩和平息個人痛苦之功能。換言之，文學作品除了反映當時的社會衝突外，更有調節社會矛盾的作用。「新女性」乃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俄國社會最具衝擊性的社會問題之一，「新女性」與男權社會產生極大衝突，造成社會混亂。除了文學作品外，其他藝術作品，譬如雕像、海報及電影等同樣能反映出「新女性」造成的文化衝突與矛盾。這些作品反映部分社會現象，同時具有調節衝突矛盾之作用。因此，本論文將穿插文學作品、雕像、海報及電影等藝術作品為例，藉此表現「新女性」型塑過程與女性特質之轉變。

貳、研究目的

本論文以「俄國『新女性』型塑之文化過程：1861-1936」為題，研究沙皇政權推翻前後到蘇維埃政權穩固—這段轉折時期的女性運動及「新女性」特質轉變之文化過程。由於女性主義在各國發展情形與背景都不同，所以本論文不以特定流派的女性主義為研究途徑，而以普遍的性別認同理論，加上社會心理學(Social Psychology)的角色行為理論(role theory)分析俄國傳統女性與「新女性」之角色認同過程。最後以雷蒙·威廉斯提出的文化理論為途徑探討俄國「新女性」特質象徵的意識型態。文中以俄國獨特的社會背景與雕像、海報、小說等藝術作品為佐證，瞭解社會大眾眼中的「新女性」形象女性及其代表的社會意義。

第二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壹、研究途徑

本論文擬以女性主義、社會心理學及英國學者雷蒙·威廉斯的文化理論為研究途徑，以俄國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歷史發展、社會結構與制度為取樣，研究當時「新女性」特質之發展與文化型塑之過程。

⁵ 王岳川。《後殖民主義與新歷史主義文論》。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頁 176。

一、 女性主義(Feminism)

女性長久以來生活在男權社會中，男性主導的價值觀使女性在各國文化中的社會地位皆不如男性。所有法令制度、宗教規章、社會風俗、科學知識，甚至文學都是以男性視角為主軸。女性生活在飽受壓抑與不平等的環境中卻渾然不知。女性主義者認為性別認知(gender)乃是一種社會建構。由於性別的意識型態(ideology of gender)，這個世界依照特定的方式建構，造成人類以某些假設來解釋男人和女人之間的差異，⁶ 譬如男性天生理性、強悍、具競爭意識，女性則天生感性、柔弱、喜好安定等等。男人和女人在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並非由生理構造所決定。生理性別(sex)確實造成男女身體上之差異，但最重要的是人們如何看待這些差異。⁷ 透過性別社會化，男孩與女孩漸漸瞭解何謂男女有別的適當行爲。譬如說，父母、老師和社會在對待男孩與女孩的時候採取不同的態度，對他/她的行爲也有不同的期望。在特定的時代與社會中，男人和女人各有其特定的角色期待。換言之，不同時代或不同社會擁有不同的角色期待。由此可見，性別認知絕對不是天生，而是由文化所建構。

至於如何解釋女性的從屬地位與如何啓蒙女性等問題，女性主義者並無定論，這也是女性主義之所以有眾多流派之因。⁸ 但女性主義者一致認為解除女性所受的壓迫為當務之急。女性擁有共同的利益，因為她們同樣受男人剝削與壓迫。女人獨自構成一個階級，和另外一個階級—男人—互相競爭。⁹

雖然，女性主義一詞直到二十世紀中期才出現，但十九世紀中葉在俄國便出現為兩性平等而努力的「新女性」。本論文以女性主義者的觀點出發，探討自我期許的「新女性」在男權社會的剝削下產生的角色衝突與自覺。

⁶ Abbott, Pamela and Wallace, Claire。《女性主義觀點的社會學》。台北：巨流，1995，頁 12。

⁷ 同上註，頁 15。

⁸ 對社會學有較大影響的女性主義有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激進、社會主義四大流派。

⁹ 如註 6，頁 23。

二、 社會心理學(Social Psychology)

社會心理學為研究個體人格、心態與行為如何受社會文化環境影響之科學。社會心理學家認為個體的人格、心態、行為雖受生理因素影響，但最主要的決定因素乃是社會文化環境。他們主張人是經由社會化才變成「社會人」，具體來說，社會化為一個內化社會價值標準、學習角色技能並適應生活的過程。現代心理學的行為學派提出的「人性白紙論」(Tabula Rasa) 完全否定先天本能因素的重要性，主張「人性」為後天經驗的產物，它塑造、成長於社會文化環境中。¹⁰

角色行為理論(Role theory)為社會心理學的主要理論之一。角色乃是個體因佔據某個社會位置而產生的行為與心態¹¹。每個人都會依據個人經驗、自我參與(self-involvement)及行使角色時間等要素決定角色行為。然而，個體對自身的角色期待與社會對其角色之期待也會影響個體行為，角色特質的模糊不清會造成個體無所適從，甚至破壞其社會與人際關係¹²。除了個體與社會的角色期待不同外，個體的角色多樣化所造成角色衝突也會影響其行為。角色衝突(Role Conflict)乃指個體因扮演不同角色，或由於不同的角色要求而引起的行為衝突與矛盾。在無力改變外在環境的情況下，個體為了消除角色衝突必須改變自己的信念與價值觀，透過改變個體對外在刺激的詮釋消除自己的憂慮與緊張。¹³

關於性別的角色認同也是伴隨角色社會化而展開。為減少性別角色期待之差異與女性多重角色之衝突，性別角色社會化的實質就是就是學習配合他人（即社會）之期待，最後達到「客我」的完成。¹⁴ 本論文藉由社會心理學理論分析社會化對俄國女性的影響，以及衍生出的角色衝突。

三、 英國學者雷蒙·威廉斯之文化理論

¹⁰ 張華葆，《社會心理學理論》。台北：三民書局，1986，頁3。

¹¹ 同上註，頁155。

¹² 同上註，頁159。

¹³ 同上註，頁170。

¹⁴ 鄭杭生，《社會學概論新修》。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頁184。

英國學著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1921-1988)為二十世紀中葉最重要的新馬克思主義文化批評家。他在《馬克思主義與文學》(Marxism and literature)一書中對意識型態與文化霸權等概念皆有深入探討及分析，尤其他以主流(dominant)、殘餘(residual)與新興(emergent)三種概念分析的文化霸權理論對後世的文化研究者帶來極大影響。

威廉斯認為文化不只是社會規範或社會規範的形成過程，而形成的過程中，由不同變數(variable elements)之間所產生的互動關係(dynamic interrelation)。當某種文化過程運作時，某些決定性要素的浮現會與一些不同的變數產生互動。這些決定性要素或特質形成主要的(dominant)價值體系，為大多數人在特定時期所共同遵守。但是過去所殘留的一些要素有時仍留在現有的文化結構中，形成所謂殘餘文化(residual)。而文化發展中，新興的(emergent)一些價值與觀念又逐漸成形。文化就是這三種力量(dominant, residual, emergent)互動的結果與反應。¹⁵本論文擬用雷蒙·威廉斯的此一文化理論研究「新女性」概念型塑過程中的三種文化力量的相互作用及差異，並分析其社會文化發展過程。

貳、研究方法

本論文擬採用下列研究方法：

- 一、 文獻分析法：本論文擬運用此分析法在俄國革命前後的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變動之相關文獻資料。將從社會心理學角度分析影響「新女性」概念產生之因素及其作用。
- 二、 文本分析法：將以俄國相關議題之文學作品及評論為例，分析當時知識份子對「新女性」的態度與批判；並分析俄國女性主義者的著作以瞭解她們對「新女性」的認知與期望。

¹⁵ 陳超明。〈狄更斯小說中的性關係〉，《中華民國第五屆英美文學研討會論文集》，1997，頁 475。

三、 比較分析法：將三種不同的「新女性」概念及特徵作對比分析，試圖比較三者之間的銜合與落差。

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貢獻

壹、研究限制

涉及俄國「新女性」的文學作品與社會評論不勝枚舉，但論文篇幅有限，僅挑出十九世紀作家、女性主義者及蘇聯作家的幾部作品為研究佐證，加上海報、雕像、電影等大眾傳媒為例，讓「新女性」形象更為生動鮮明。俄國方面較少有關「新女性」或女性解放等主題之研究，因此，資料來源多為中文或英文書籍，俄文資料略微不足。筆者期望本論文能開啓俄國性別議題研究之風氣，為傳統的文學研究帶來新的視角及看法。